

长城,到底修了多少次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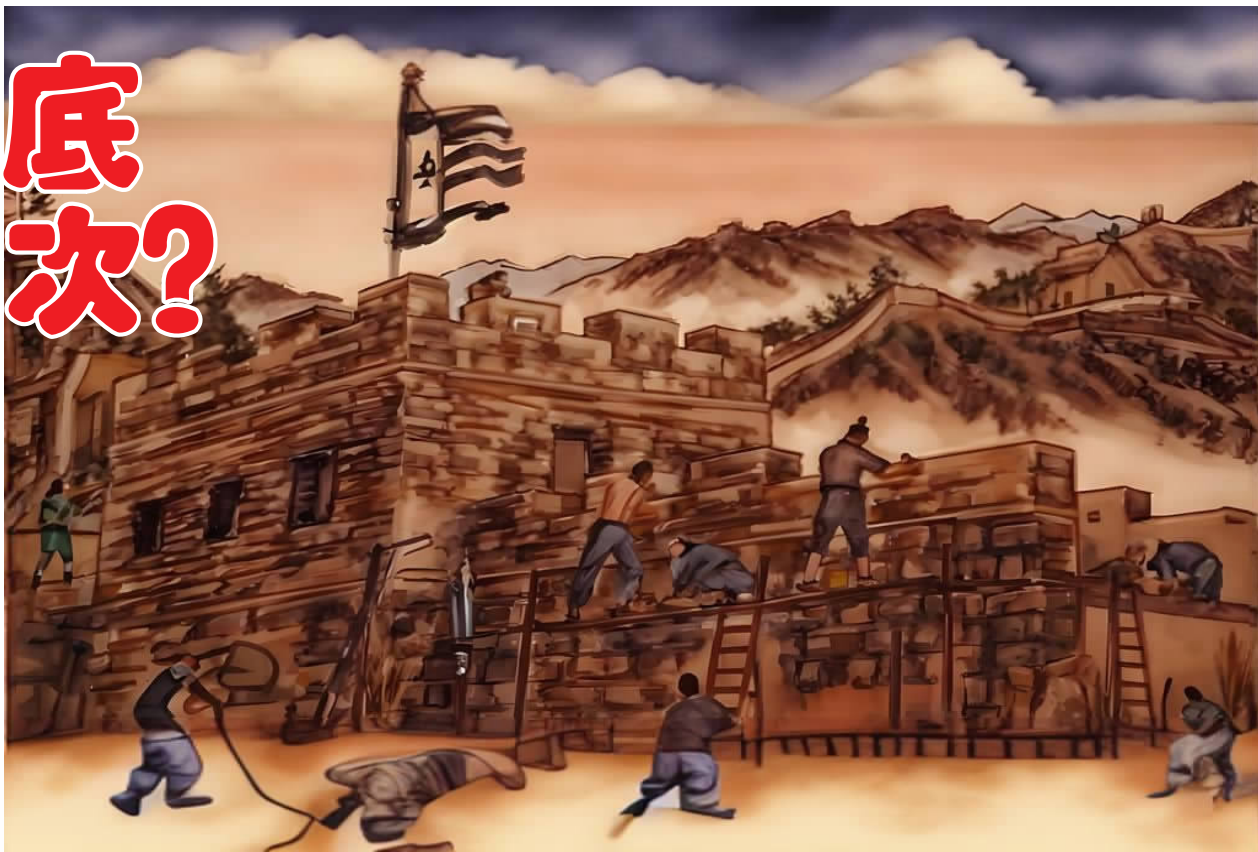
“万里长城万里长,长城外面是故乡。”长城,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,在全世界炎黄子孙心里,都占据着无可撼动的地位。其实,长城并不仅仅是一道城墙,而是以城墙为主,由烽燧、墩台、壕沟、关口等辅助设施组合而成的大型军事防御工程。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,具体位置各有不同,也分别拥有“界壕”“边墙”等不同名称。

据史书记载,最早的长城,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所建的楚长城,分布于今天河南与湖北交界一带,至今已有 2600 多年历史。此后,由于战争频繁,齐国、燕国、魏国、赵国、秦国等,先后都在各自边境一带修建长城。

秦统一六国后,为了防止北方匈奴入侵,将战国时秦、赵、燕三国各自修建的长城联结起来,修建起一道西起临洮,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。今天的宁夏固原、陕西榆林、内蒙古包头等地,还留有部分秦长城遗址。此后,伴随着汉朝的开疆拓土,汉长城在秦长城的基础上继续向西延伸。

从魏晋到隋唐,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,大多沿用秦汉长城旧址,并结合本朝实际进行改造、重建,其长度、位置各不相同,也随着王朝国力的强弱而进退不定。总体来看,历朝历代长城遗址,基本沿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南界和阴山东西一线上下摆动。其中,辽金两代的长城修建比较特殊。辽代和金代都以北方民族政权起家,其国防重点在更加西北方向的蒙古高原,因此,辽代在蒙古高原东北部、金代在大兴安岭沿线都曾修建长城。

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,绝大部分是明朝修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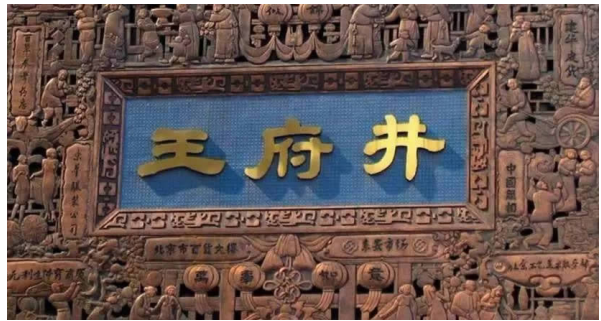
的,而且是明朝中期以后才大规模修建的。1449 年土木堡之变以后,明朝国防压力渐渐增大,修建长城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。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,榆林、大同、宣府、蓟镇、辽东等重镇纷纷开始建造长城。也就是说,明朝的长城,是各边镇在不同时间分段进行修建,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才慢慢连为一体的。

伴随着时间的推移,各处长城逐渐连成一线,和山海关、嘉峪关等各处关城一道,成为捍卫中原的重要屏障。可以说,明长城从开始修建到连成一线的过程,就是明朝九边防御体系建立的过程。

清朝以来,长城内外都纳入中国版图,长城的国防作用,渐渐淡化了。

(光明网)

王府井究竟是哪个王府的井



王府井大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,街道全长 1818 米。像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道一样,王府井大街早已经名声在外了。对于众多的国人来说,到北京一趟,逛王府井和爬长城一样,是必不可少的日程。许多人刚听到王府井这个名字时往往会有些奇怪:哪家王府的井这么有名?

王府井大街本名“十王府街”,亦称“王府街”。明代这条街上有 10 座王府、3 座公主府。清依明制,亦在此街上建王府。据古建筑学家朱启钤回忆,以豫王多铎(1614—1649,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)府最大,今协和医院不过是其中一部分,连帅府园箭厂当年也包括在其中,乃王府卫队的操练场。多铎战功卓著,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,地位特别尊崇,故清代多称此街为“王府街”。

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重新厘定地名,因街的南端有一甜水井,故与王府合称,改名为“王府井”。

据光绪十一年(1885)《京师坊巷志稿》记载,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 1258 口井,绝大多数是苦水井,做饭不香,洗衣服不干净,洗头发黏手。甜水井是稀缺资源,故名声特别响亮。王府与井并称,这就标明了街道首尾的标志性建筑,根据清代地图,此井为该街唯一的一眼井。

王府井的繁华,得益于老东安市场,那里原本是明代一座王府,清初封给吴三桂,改称“平西王府”。“三藩之乱”后,王府改成神机营的操场。清初内城为八旗驻扎,不允许汉人居住,一直少有买卖,但末期东交民巷使馆区已成国中之国,清政府禁令事实上已经失效。

1903 年,经善耆、那桐奏请,慈禧批准,废弃已久的神机营操场被迫开放给游商,一举打破了老城区原有的宁静。由于顾客密集,距离适宜,各国商号也来此街经营,王府井商业街迅速走向繁荣。

有趣的是,王府井大街还有一个英文名,叫“莫理循大街”。

1949 年之前,王府井大街南口的墙上,镶嵌着“Morrisson Street—莫理循大街”的英文路牌。莫理循(1862—1920),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。1887 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,1894 年,他游历中国南方,一年后,其游记《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》在英国出版,因为这本书,他被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赏识,聘为驻中国记者,1897 年到达北京,开始了长达 17 年的记者生涯。

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上住了很多年,由于他在西方知名度很高,当时外国人记不住“王府井”这么复杂的中文名字,故在地图上标为“莫理循大街”。(镇江社科网)

中国历史上首位“坐堂医”

东汉末年,时局动荡,战乱频发。旱灾、蝗灾、地震接踵而来。瘟疫一触而发。157 年(汉桓帝永寿三年)人口调查数据显示,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 5648.6 万;到了 280 年(晋武帝太康元年),一百余年间,人口跌至 1616.3 万,简直可以说是“断崖式”下降。人口锐减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频繁发生的瘟疫。仅在公元 196 年—220 年(汉献帝建安年间),有史可查的大规模瘟疫就发生了 5 次。

当时,南阳郡涅阳县(今属河南省邓州市)有一个张姓家族,全族总人口有 200 多,从建安初年开始,不到 10 年,多人因传染伤寒而亡,将这件事记录下来的是这个家族里一名叫张机的人。张机,字仲景。当时,张仲景原本已被举为孝廉,仕途前景一片光明。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,这个机会相当宝贵,全国每年只有数十人有幸得到这个机会。然而,目睹身边的人连遭不幸,张仲景立志从医,拜本郡名医张伯祖为师,没日没夜地刻苦钻研医术。他的主攻方向是瘟疫,取得了许多诊断和治疗的经验。

一个人本事再大,在大规模疫病面前也是杯水车薪,懂得瘟疫防控与治疗的医生越多,老百姓的生命才越有保障。为此,张仲景撰写了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,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载有方剂 113 个,张仲景的另一部医学著作《金匮要略》中载有方剂 262 个,除去两书重复之处,实收方剂 269 个,有些至今还在被人们所使用。

不仅如此,《伤寒杂病论》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制定了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,这种先“辨证”再“施治”的方法一直被后世中医所推崇。更值得后人钦佩的是,在担任长沙郡太守期间,张仲景每天要处理很多公务,忙得不可开交,即便如此,他仍坚持给百姓看病。平时还好,瘟疫流行时,大量染病的老百姓就医无门,张仲景想了个办法——每个月留出固定时间,官府衙门不处理其它公务,让百姓进来看病,诊断、治疗的地方就设在官府大堂上。由此,张仲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“坐堂医”。(北京日报)

